

#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联合决策模型及政策含义

李楠

(广东药学院 医药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本文在贝克尔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共同决策模型, 研究了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劳动时间配置与家庭福利间的关系。研究显示, 家庭综合收入最大化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关键, 在当前约束条件下, 女方选择留守, 丈夫外出打工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无奈选择。本文提出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培训留守妇女与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方面出发, 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 留守妇女; 家庭; 联合决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9)01-0046-05

## Joint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Policy Meaning of Rural Women Staying at Home

LI Nan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al Busines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builds a joint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rural women staying at home under Becker's theory framework, and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of rural women to stay at home in allocating working hours and family welfare.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ences from some parts, it is shown that the maximum of family comprehensive income is the key to maximizing the family welfare. In the current constraints, the choice of staying home for the woman and working out for their husbands on the other side is the only alternative for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for their family. It is recommended in the article to seek a solution to the issue by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ining women who stay home, planning the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s.

**Keywords:** women staying at home; family; joint decision-making model

###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和城镇的转移, 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留守妇女群体。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白南生教授指出, 以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3亿计算, 外出农民工中已婚人数为10621万人, 已婚比例为81.7%。从已婚人数中减去举家迁移的人口大约3900万, 则已婚流动人口中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21万, 再以70%男性计算, 则‘留守妇女’人数达到4700万<sup>[1]</sup>。然而如此庞大群体的生活状况却一直为各界所忽视, 直到2004年媒体和社会学家才开始关注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问题。相关调研发现留守妇女承担

收稿日期: 2008-03-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0673024)

作者简介: 李楠 (1972-),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广东药学院医药商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着家庭中的农业生产劳动、孩子教育、老人照料等责任，而且还面临着孤独、离婚率上升、易遭不法侵害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虽然留守妇女面临着各方面沉重的压力，但农村家庭却继续自愿做出丈夫外出打工、妇女留守的理性选择。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选择的决策进行分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关于家庭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在这里我们按照费孝通的定义将家庭理解为一个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单位。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sup>[2]</sup>。经济学家认为家庭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与单个人居民户相比，男女双方组成家庭并进行联合生产和分工会产生较多的剩余。为了实现这些潜在的收益，形成了“婚姻”这一有约束力的合同。由合同产生的剩余的分配必须建立在每一个成员的利益之上，并且反映了内部协商的结果。如果双方都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那么只要某一方在分配中的效用低于他在不合作情况下的效用，一致赞同的结果就无法达成，婚姻无法达成或发生破裂<sup>①</sup>。

在家庭行为的决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将家庭视为个人，家庭在合并收入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新古典决策理论忽视了家庭内部结构对家庭的影响，不符合“经济人”的微观个体假设，因此无法用于家庭联合决策的微观分析。

对此，萨缪尔森（Samuelson）试图以包含家庭成员个人效用的社会福利函数取代家庭的单一效用函数，但这一改进只是在家庭消费选择上做出的，缺陷依然明显。刘茂松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在其经济活动中，既有消费活动，同时也有生产活动和投资活动，因而是一个集生产、投资和消费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的经济实体<sup>[3]</sup>。贝克尔（Becker）开创性的把理性选择分析原理用于家庭问题的分析上，认为家庭与婚姻是个人福利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他将家庭视为一个有效率的生产单位，用利他主义家长效用函数代替家庭效用函数，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Rotten kid”定理。该定理认为一个利他主义家长的转移会使利己的其他家庭成员自动追求家庭总收入的最大化<sup>[4]</sup>。

萨缪尔森和贝克尔的家庭决策模型都只具有一个效用函数，这又被称为“单一决策模型”或“共同决策模型”。这一模型虽然可以成功解释家庭合作关系的形成，却无法说明离婚这类家庭内部冲突的形成，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又提出了复合决策模型。该模型认为每个家庭成员都只追求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家庭效用函数是各家庭成员效用的复合，复合方式取决于各家庭成员在家庭决策中的相对地位。

本文认同贝克尔的观点，即利他主义者和受益人也不会以对方更大的收入牺牲为代价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宁愿以自己较少的收入牺牲换取对方较大的收入增加。认为作为利他主义者的我国农村家庭，存在着一个家庭效用函数，全体家庭成员不管收入如何分配，都自愿地使这一效用函数最大化。但是在分析方法上，贝克尔采用的边际分析法存在明显缺陷。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指出个人做出决策时是首先确定自己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做出角点解选择后才转入资源配置问题。本文以贝克尔的理论为基础，运用离散选择模型来研究我国农村家庭如何对劳动力配置进行联合决策，使得家庭效用函数最大化。

## 三、农村家庭决策模型构建

在构建模型前，需要首先指出的是我们在模型中假设不考虑家庭中的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家庭的亲情等暂时不计，即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或价值判断。本文认同，在家庭决策中，每个家庭的偏好是不同的，有些家庭对家庭亲情和团聚更加偏好一些，则可能选择不外出打工或共同外出打工。如果家庭的偏好是经济收入，则选择单方外出打工的可能要高一

① 事实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感情等力量或其他原因，存在着一方为另一方做出“牺牲”，甚至是长期的“牺牲”，这里不对此进行讨论。

些。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感情和归属上的需要、地位和受人尊敬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人类总是先追求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所以对于家庭人均收入较低的农村而言，做出重视家庭经济收入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另外，家庭决策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家庭不因丈夫外出打工而产生破裂，如果留守而导致家庭解体，则留守的选择是不理性。因此，留守的前提是家庭仍然存在，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模型中家庭参与决策的主体为丈夫与妻子，而家庭决策的目标是家庭效用最大化。如果  $U$  为家庭获得的效用总量， $x_1, x_2, x_3 \dots x_n$  为  $n$  种消费品或服务的消费数量，则家庭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 = f_x(x_1, x_2, x_3 \dots x_n)$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该效用函数连续，具有一阶和二阶偏导数，并且是一个严格的凹函数。其中的商品与服务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也可以由家庭自有时间来生产。如果采取前者的方式获得商品与服务，则需要将家庭自有时间投入到外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打工获得工资收入，或者将农产品销售到市场中获得农业经营收入。设其中  $x_1 \dots x_m$  的产品与服务在市场中购买，而  $x_m \dots x_n$  的产品与服务由家庭自我生产  $S$  来提供（其中包括闲暇这一种产品），其数量和质量由家庭自我生产时间  $t_i$  决定。

在忽视农村家庭的储蓄投资行为下，劳动收入最终将全部转换为家庭消费。根据“家庭收入等于家庭商品消费”可知：

$$Y = \sum_{i=1}^m p_i x_i \quad (\text{其中 } p_i \text{ 为第 } i \text{ 种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 } Y \text{ 为家庭收入}) \quad (1)$$

从收入来源看，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分为：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用  $Y_n$  表示；非农业收入（打工收入）用  $Y_g$  表示；其他收入，如政府的补贴、转移支付等，这一部分的收入是相对固定的，用  $Y_c$  表示。于是农村家庭货币纯收入  $Y$  又可以被写为：

$$Y = Y_n + Y_g + Y_c = t_g p_g + f(t_n) + Y_c \quad (\text{其中 } p_g \text{ 为在非农就业时的纯工资率, } f(t_n) \text{ 为农业劳动时间的生产函数; } t_g \text{ 和 } t_n \text{ 分别是农村家庭在外出打工和农业劳动中的时间投入量}) \quad (2)$$

我们同样可以将家庭自我生产  $S$  用劳动时间的形式来表达，函数式为：

$$S = \sum_{i=m}^n x_i = f(t_i) \quad (f(t_i) \text{ 为家庭自我生产时的生产函数, 是投入自我生产时间 } t_i \text{ 的增函数, 产品为 } x_m \dots x_n) \quad (3)$$

将式（1）、（2）、（3）带入初始的农村家庭效用函数后，我们将其转换为自变量为家庭时间的形式：

$$U = f_x(x_1, x_2, x_3 \dots x_n) = f_{Y,S}(Y, S) = f_t(t_g, t_n, t_i) \quad (4)$$

从而得出了家庭最大化效用的约束条件——家庭时间限制：

$$T = t_g + t_n + t_i \quad (T \text{ 为家庭的全部自有时间, } t_i \text{ 为自我生产时间})$$

据此，我们将农村家庭的决策问题转换为农村家庭如何将有限的自有时间分配到市场生产与家庭生产中，从而获得总效用最大化。根据新兴古典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家庭劳动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条件为在不同领域时间配置带来效用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即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相等：

$$\frac{\partial U}{\partial t_g} = \frac{\partial U}{\partial t_n} = \frac{\partial U}{\partial t_i} \quad (5)$$

必须注意的是，劳动投入不同领域的产出规模效应是不一样的。农民外出打工，接受的是固定的市场工资率，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点；在家务农时，由于农地规模的限制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其产出报酬往往具有明显的规模不经济的特点，普遍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家庭内部

的自我生产函数同样具有规模不经济的特点<sup>①</sup>。因此非农就业效率决定了农村家庭的纯收入，其决策的关键是如何将农业领域的配置效率低下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报酬的非农领域，从而实现家庭纯收入的增加，进而使得家庭福利水平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将家庭的自我服务产出  $S$  用价格进行换算，可以将自我产出  $S$  转变成货币收入  $Y$  的形式。

$$Y_s = \sum_{i=m}^n p_i x_i \quad (\text{其中 } p_i \text{ 为第 } i \text{ 种自我产出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 } Y_s \text{ 为转换后的家庭虚拟货币收入})$$

这时的家庭效用函数形式就完全转换成了以货币收入为自变量的表现形式：

$$U = f_Y(Y_Z)$$

家庭效用由将实际货币收入和虚拟货币收入相加所得的综合货币收入  $Y_Z$  决定，综合货币收入越高，家庭总效用越高。下面以家庭综合货币收入为中心来对家庭决策进行分析。

#### 四、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决策的逻辑推理

在实际中，家庭决策首先确定自己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做出角点解选择后才转入资源配置问题。分析可知可供农村家庭选择的选择集为：1. 夫妻双方都不外出打工，将  $t_w$  全部投入到农业生产经营中（这可以被视为农村家庭决策的初始状态），在后面的分析中用下标 0 表示；2. 夫妻双方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守，用下标 1 表示；3. 夫妻双方向同时外出打工，用下标 2 表示。

首先分析初始状态 1 时农村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及家庭效用情况。为了区分夫妻的不同劳动力配置状况，采用下标  $a$  表示丈夫，下标  $b$  表示妻子，如果无下标则为夫妻合计。这时：

$$\text{夫妻的农业时间投入分别为: } t_{n0} = t_{na0} + t_{nb0},$$

$$\text{家庭自我服务时间为: } t_{i0} = t_{ia0} + t_{ib0}$$

$$\text{家庭的货币收入为: } Y_0 = Y_{n0} = f(t_{n0})$$

这时的家庭劳动力最优配置条件为  $\frac{\partial Y_n}{\partial t_n} = \frac{\partial Y_s}{\partial t_i}$ 。图 1 中的  $t_{n0}$  和  $t_{i0}$  是达到这一条件时的家庭劳动力分配，此时的配置实现了当前决策下的家庭综合货币收入  $Y_Z$  的最大化， $Y_Z$  的大小为图 1 梯形 ABCO 与梯形 FHIO 的面积。可见当夫妻双方都不外出打工，一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时，以当前的农地规模，必然结果是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水平较低。根据最优配置条件，家庭自我生产的边际效率也同样较低。为了寻求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农村家庭会设法重新配置劳动力，以期实现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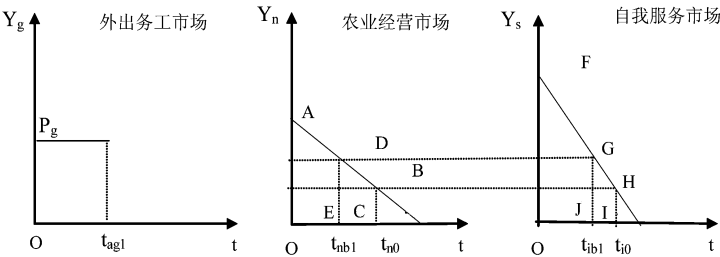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和效率

这时最常见的选择为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农村，这时的资源配置状况为：家庭外出打工时间为  $t_{eq1}$ ，家庭农业时间投入为  $t_{nb1}$ ，家庭自我服务时间为  $t_{ib1}$ 。由图 1 可知，妻子承担了丈夫在农业和自我服务上的时间投入，家庭在这两方面的时间投入都出现下降，丈夫则将自己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外出务工中。

这时丈夫的货币收入为  $Y_{eq1}$ ，妻子的货币收入为  $Y_{n1}$ 。 $Y_{eq1}$  是丈夫专门从事非农业产业的收

<sup>①</sup> 首先家庭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如此之多，其中大部分家庭都是无效率的。一般认为家庭自我服务最有效率的领域是家庭子女抚养与赡养老人，但是随着劳动时间投入增加，同样会出现边际效率递减。

入,即来自于工资部门的收入,而  $Y_{bn1}$  是妻子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看做是家庭的一种专业化分工,即男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而女性则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提供家庭服务,这也正是留守妇女家庭的特点。由图 1 可知,夫妻双方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都得到了提高。

这时理论上的最优配置条件为:

$$\frac{\partial Y}{\partial t_g} = \frac{\partial Y}{\partial t_n} = \frac{\partial Y}{\partial t_i} = P_g$$

由于丈夫和妻子的工作时间不可交换,故时间分配是不连续的。所以该最优配置条件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考虑丈夫将全部时间投入打工中,因此只需要妻子的时间配置满足  $\frac{\partial Y_n}{\partial t_{nb1}} = \frac{\partial Y_s}{\partial t_{\#1}}$ ,这时的家庭时间配置就已经是最优了。此时家庭的综合货币收入  $Y_z$  为图 1 中外务工市场上的矩形加上梯形 ADEO 与梯形 FGJO 的面积。由于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这时的家庭综合货币收入  $Y_z$  要显著高于选择共同留守时的收入。可见这一选择能够带来家庭收入提升,使得家庭福利提高。广东省妇联 2007 年的调研支持了本文这一结论,其调研显示 2006 年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平均收入为 11002.98 元。这样的水平明显高于广东省农村的整体平均水平 4690.49 元。同时在调查的家庭中丈夫的收入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占到了 87.2%<sup>[5]</sup>。

既然外出打工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如此显著,为何大部分农村家庭不选择夫妻共同外出,共同进入收入较高的务工劳动力市场呢?就图 1 情况来看,夫妻双方一同打工使得家庭综合货币收入  $Y_z$  进一步提升并非不可能,其成立条件为妻子的外出务工收入要高于梯形 ADEO 与梯形 FGJO 的面积,即妻子留守的机会成本高于收益。农村留守妇女的现状解释了为何大部分妻子选择留守而不是一同外出。调查显示留守妇女是农村中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这意味着她们外出务工时将面对一个较低的市场工资率,其工资收入难以抵偿带来的经济损失,自然会理性的选择留守。广东省妇联 2007 年的调研显示大多数留守妇女家庭仍然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之中,如果她们也外出打工则需要请人照顾老人与小孩,无疑这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sup>①</sup>。

对妇女留守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市场发育不完善,非农就业不稳定,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巴丹(P. Bardhan)曾经通过一个农业家庭模型证明,在完善市场和不完善市场条件下,家庭的生产、消费决策是不同的。在完善市场条件下,家庭优先考虑最大化利润,然后在标准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家庭的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即存在“分离特性”;如果存在多种市场的不完善,分离特征不再成立,家庭也不再最大化利润,生产决策取决于家庭的偏好和禀赋。可见,在市场不完善和存在市场风险的情况下,我国的农村家庭将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禀赋,通过生产部分自己所需的消费品与服务来避免风险,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下,入城打工无法为农民提供一个稳定长远的预期。因此,即使妇女外出打工可以实现家庭收入的增加,出于回避市场风险的考虑,妇女也会选择留守在家务农。

五、政策含义

本文在贝克尔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我国农村家庭共同决策模型,研究了农村家庭劳动时间配置与家庭福利间的关系。对模型的分析表明,在当前约束条件下,农民选择一方留守,另一方外出打工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无奈选择。这一分析解释了为何我国会出现庞大的近 5000 万农村留守妇女队伍。从部分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也支持了收入最大化是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的目标。(下转第 90 页)

① 广东省妇女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劳动经济所,广东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状况调查,广东省妇女研究中心,2007。  
• 50 •

元根本不能起到什么作用。66.67%的受助者（受助家庭成员）认为目前农村低保的首要问题是保障水平太低，26.67%的人认为首要问题是政策限定条件过严，而6.67%的人认为申请手续过于复杂。仅有6.67%的受助对象表示接受低保后生活“好多了”，而90%以上的人则表示接受低保对他们的生活改善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许多困难家庭的生活拮据，朝不保夕。

### 第三，政策宣传上的不到位导致农村人口认知上的空缺。

根据数据显示，农村社区中仍有35.16%的人对低保一无所知，仅有21.10%的农民表示大概了解或非常了解农村低保，近一半的农民对政策只了解一点。当被问及为何不申请低保时，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户对申请事宜一脸茫然，或是对复杂的申请手续望而止步。事实上，现行的农村低保已贯彻了尽可能精简的申请手续，为潜在的受助对象提供了很大便利。故归根溯源，问题还在于政策宣传上的不到位，亟须突破政策过程中农民主体缺失的问题。

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核心项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低保的每一步发展都关乎制度的整体进程。农民对实现三者的城乡衔接呼声也最高。自新农村建设以来，三大项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然而发展中的困境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相对于社会保障的整个体系而言，这种发展困境就显得更为严峻和棘手。三大项目的共同瓶颈在于制度的低位保障，亟须加大各个项目的保障水平。同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必须在筹资机制和政策稳定性方面进行改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需稳固制度发展的原则性，并进行更人性化的制度修订；低保的重点在于有效落实“应保尽保”。

#### 参考文献：

[1] 林闯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缺陷与挑战 [J]. 医院领导决策参考, 2006, (1).

[责任编辑 童玉芬]

(上接第50页)

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出现如此庞大的家庭两地分居现象对于家庭和个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相违背。决策模型显示农村妇女选择留守的因素主要是自己外出打工收益低和帮助家庭避免外部市场风险。政府如果希望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应该对留守妇女进行免费培训，提高她们一同外出打工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应该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给农民的非农就业一个稳定预期，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而不是在城乡间来回流动。

从入城农民工的非农就业发展来看，需要他们转变观念，能够留在城镇非农产业中作为产业工人，而这可能需要在户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

从留守妇女的另一个侧面来看，“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并不一定由其在非农产业中的预期决定，可能与其家庭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已经不是单个的“农民工”向城镇和非农的转移，而是整个家庭向城镇和非农的转移，而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1] 邢志刚，李先昭. “留守妇女”生存状况堪忧，中国妇女报，2006-12-05.

[2]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1.

[3] 刘茂松. 论现代家庭经济实体的特性 [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4).

[4] 加里·贝克尔. 家庭经济分析.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童玉芬]